

第十一章 泰兴《张氏宗谱》

(三凤堂)



第一节 原文影印

孝子傳

孝子姓張名本真字天爵河南人橫渠先生之後自幼事親本平天性出入起居必告溫清定省不違嘗自謂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惟恐忤其意觸其怒每遇事必先以意迎之務欲其親歡悅而後已家庭之間和氣藹然叱咤之聲未嘗有聞飲食供奉特其餘事耳宋建炎初孝子始有知職河南時疫流行孝子父亦得此疾孝子憂疑改容失色日則迎醫調治夜則焚香告天求以身代從此病勢漸輕雖日死生修短有數而孝子醫禱並行感動天地之驗不可証也越數年孝子時年若干父以陳言事得罪官府被執孝子頓首哀告

卷之二

墓誌

敦睦堂

敦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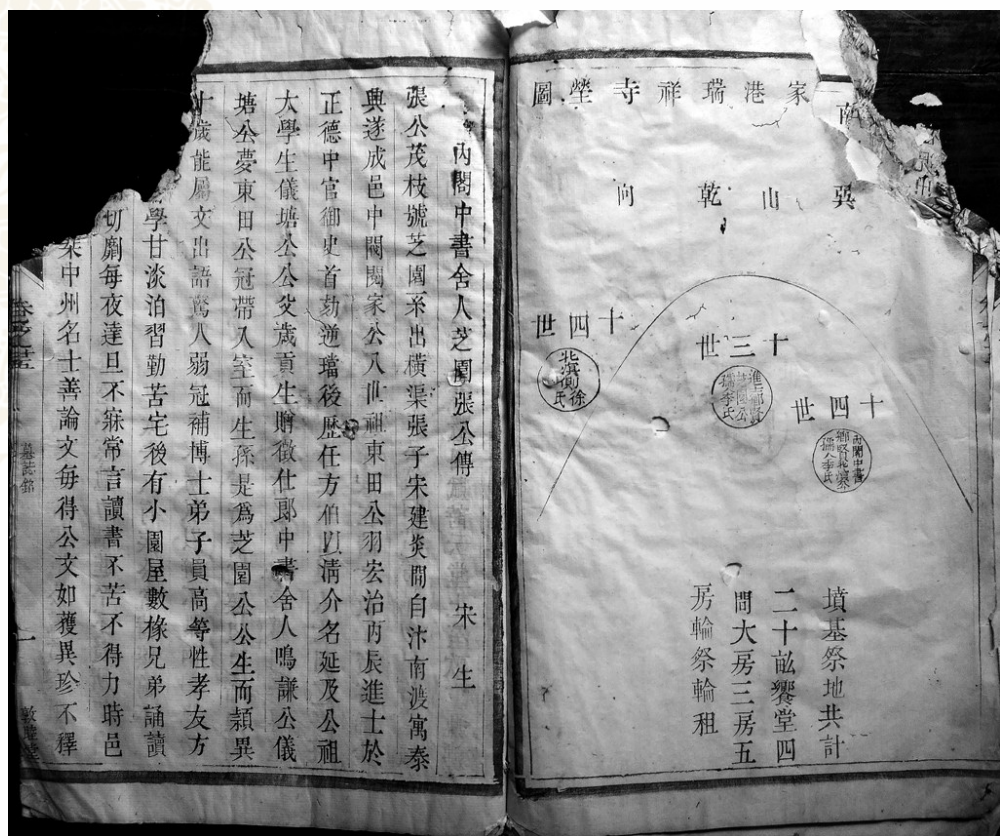
求釋其父至於流血官府見其迫切釋其父而執孝子孝子知其親而不知有其身雖在縲絏而不怨惟以得釋其父爲幸由是鄉人化之咸稱之曰張孝子云於乎自古忠臣孝子猶麒麟鳳凰世不常有者也亦有表襮其美弗彰予責在外史故據拾其事如左以備觀風者之採焉

徵爲江寧監察御史繼舉于鄉正德七年壬申亦被徵爲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太孺人復謂曰少年登高科且兄弟並爲美官古之人不以爲幸汝曹勉之羽兄弟受教惟謹是歲羽以上兩宮徵號恩贈侍御君如其官太孺人始膺封命八年癸酉羽擢知北京保定府甫至而疾遂連疏乞歸太孺人聞之怡然命諸子連書曰汝即還吾老須汝在左右羽歸念無以爲養會鄉郡故老欲延之教授生能奉百金爲太孺人壽以請太孺人謂羽曰汝以病不能爲教又能爲師邪汝雖貧必辭毋往甲戌聽亦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命羽戒之曰汝宜竭誠報國無他計也諸子雖長且貴各有室家務亦

皆太孺人綜理內外斬新同敢有廢業者是以門祚日盛於前病且篤諸諸子曰汝曹居家務孝出仕務以清白奉職慎毋忤于先人語諸婦曰若屬善助夫爲義令人道汝姑賢無道汝婦非賢乎平日爰教於故潘孺人者亦勉是爾蓋其天質純美成於外氏之姆訓與侍御君之家範故自少至老稱淑女稱賢婦稱令母人無間言卒之日親族姻黨莫不悼惜日今安復有如張太孺人者邪太孺人生於正統十一年丙寅三月十有六日年十七子六人長卽羽配李氏次卽翀配成次翕配李次翹配蔡次卽翹配封次翊配李皆名舉輩幹蠱翹翊爲縣學生女二長適何珊次適李僕孫男十有一人



家規家訓



第二节 规训内容

一、张孝子传

《张氏家乘·孝子传》全文如下：

“孝子姓张名本真，字天爵，河南人，横渠先生之后。自幼事（注：事：侍奉）亲本乎天性（注：天性：先天的本性），出入起居必告，温（注：温：暖和，不冷不热）清（注：寒凉，冷）定省（注：探望，问候）不违，尝自谓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惟恐忤（注：违逆，抵触）其意（注：意向，愿望），触（注：触动，引发）其怒（注：生气，愤怒），每遇事必先以意迎（注：迎：承奉，迎合）之，务欲其亲欢悦而后已（注：已：完成，完毕）。家庭之间和气藹（注：藹：美好）然，叱咤（注：叱咤：怒斥，呼喝）之声，未尝有闻，饮食供奉，特其余事耳。宋建炎初，孝子始有知识（注：知识：本指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是在后天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这里指方长大成人），河南（此处有误）时疫流行，孝子父亦得此疾，孝子忧疑改容失色，日则迎医调治，夜则焚香告天，求以身代，从此病势渐轻，虽曰死生修短有数，而孝子医祷并行，感动天地之验，不可诬也。越数年，孝子时年若干，父以陈言事得罪官府被执，孝子顿首哀告，求释其父，至于流血，官府见其迫切，释其父而执孝子，孝子知有其亲，而不知有其身，虽在缕继（注：继：系、拴、捆绑）而不怨，惟以得释其父为幸。由是乡人化之，咸称之曰张孝子云。於乎，自古忠臣孝子，犹麒麟凤凰，世不常有者也。不有表襮其美弗彰。予责在外史，故摭拾其事如左，以备观风者之采焉。”

《孝子传》介绍了孝子的姓名、字和籍贯，是名儒张载后裔。孝子自幼侍奉父亲出于先天的本性。出门、回家、早上起来后都要去禀告父亲，无论寒暑都按时去探望、问候父亲。他的信条是：没有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我不可以长大成人;不顺从父母亲的意志做事,就不是一个好儿子。平时做任何事,他都诚惶诚恐,惟恐违逆了父亲的意愿,引起父亲生气;一事当前,必定承奉、迎合父亲的意愿,务必使父亲欢喜、娱悦才算结束。因此,家庭内部一团和气,从未听到过大声怒斥之音,至于父亲的饮食,那更是无需考虑,肯定做得很好的事情了。

有一年,泰兴病疫流行,其父也被感染患疾,张本真为此“忧疑失色”,十分着急。他虽然年幼,但很懂事,白天给父亲找医生调治,每天夜里则“焚香告天,求以身代”,祈求以自身代父有病,希望苍天保佑父亲摆脱病魔,在儿子的精心照料下,他父亲的病终于痊愈。

张本真的父亲文武全才,有着显赫的家世,“横渠公之后”,作为一个文化世家的子弟,当年在开封应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能和兄长一道杀出重围,也应有一定的武艺,但在泰兴却没有任何势力和政治地位,是一介“草民”,仅仅因为“陈言事”,向官府提了点意见,就“被执”,抓进监牢。张本真向县令磕头,头上都磕出了血,哀求释放其父。县令大人被其“感动”,居然作出了释放其父,而把张本真抓进去代替的这样一个荒唐决定。张本真虽然身陷囹圄,但无一点怨恨,惟以父亲获得自由而高兴。于是,泰兴的老百姓都被张本真的孝心所感化,称他是张孝子。并且把他居住的隆兴桥之东这块地方取名为大孝里(今名仙鹤湾)。《泰兴县志》和《张氏家乘》上都详细记载了张本真的孝行。即使到了当代,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张孝子。泰兴历史文化研究会曾编有一个《泰兴二十四孝》故事,第二个故事题目为《以身代父》,讲的就是张本真的故事。

二、张母教子

“少年登高科,且兄弟并为美官,古之人不以为幸,汝曹勉之。

汝宜竭诚报国,无他计也。

汝曹居家务孝,出仕务以清白奉职,慎毋忝(忝, tiǎn, 辱,有愧于,常用作谦辞。)于先人。

若属善助夫为义,令人道汝妇贤,无道汝妇非贤。”

以上四句话见《张氏家乘》中明兵部尚书太原乔宇撰《敕封太孺人张母蔡氏墓志铭》,均为太孺人训戒子、媳之语。



孺人是宋代开始,封官宦贵妇的称号,明清时为七品官的妻子的封号,如果是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前面要加太字。张太孺人获封赠时,儿子们尚未大贵,是以时任云南巡按的儿子张羽而获封赠的。

张太孺人(1446-1515)姓蔡,祖籍河北,其曾祖父为元朝总管,洪武初年,率众归附朱元璋后定居扬州。太孺人幼时即聪明、智慧,而且温顺,谨守闺范,女行具备,诸姐妹中难有比得上她的。出嫁后对公公婆婆能“克尽孝养”。婆婆素来治家颇严,但太孺人深得其欢心,抚爱如己出。公公去世后,婆婆年迈,家中一应大小事情,太孺人都日益敬勤,躬任其劳,不要婆婆操一点儿心。对亲戚朋友中的贫困者,太孺人经常主动的去看望他们,并及时给予资助。丈夫张黼在家中是长子,和两个弟弟相处得很好,家中充满了欢乐。他对内讲究一个仁字,对外强调一个义字,人们称其为“善士”、“廉吏”,而这些都得益于太孺人是一个贤内助。张黼曾任北京保定府定兴县丞,秋毫无取于民,并多有建树。后积劳成疾,欲辞官,但上司坚决不同意,要他在职养病。太孺人对他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视事,怎么能在儿坐拿朝廷俸禄呢?儿子们都大了,让他们去报效国家吧,我们应该退休归省了。”

张家为大儒**张载**之后,是公认的书香门第。张黼为国子监生,其祖父张忠为永乐十七年贡生,官饶州府知府;父亲张琳为正统九年岁贡,官山西交城县县丞;叔父张城为景泰元年举人,官中书舍人。但太孺人夫妇仍“恐书香或泯”,为了给儿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将浙江名进士李文昭“延为之师”,李文昭水平高、教得也好,长子张羽、次子张翀、八子张聰相继高中进士,四子张翹、九子张駒为贡生,即使没有功名的三子张翥,也“长工於诗,为句清雅”,并有诗集《石亭稿》存世。但是,李文昭工资也高,张黼虽说是个“节俭周谨”之人,面对动辄“百金”的教师工资也力不从心,钱不够,太孺人不肯让儿子们荒废学业,让丈夫向他的堂兄弟借银子作师资。

太孺人对家族最大的贡献是教子有方。儿子中不但有三进士、两贡生,而且有二人入选乡贤祠。乡贤祠在孔庙内,所祭的都是本地的大儒、名臣、忠士、孝子等,他们都是地方精英。因此,入祀乡贤祠的人是极大的



荣耀,对整个家族来说也是光耀门楣。同时,入祀乡贤祠的人员受到严格限制,制定有严格的标准。泰兴历宋、元、明、清四朝近千年,仅评出乡贤十二人,而太孺人的儿子张羽、张𪔐能同时入祀乡贤祠,表明了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已经被官方和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一个实在的道德标准。于是,人们都说:(张氏)一门衣冠之盛,著称于淮海间,这些都是太孺人教导有方啊。

后来,张羽官至河南左布政使(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张𪔐官至广信府知府,张𪔐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对于身居高位的儿子们,太孺人对他们抓得很紧,在儿子们仕途的关键时刻,她都给予及时的训导。

丈夫去世后,长子张羽在家守孝三年期满后,因为太孺人年龄大了,想在家尽孝,不想出去做官,太孺人促其行,让其成父亲报国之志。

正德二年(1507)、正德七年(1512),张羽、张𪔐相继被征为监察御史。按明制,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因其是“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官位虽不高,但权势颇重,能任此职者须是朝廷所信任重用者。因此,社会上都认为这是件很荣耀的事。但太孺人却认为:“兄弟并为美官,古之人不以为幸”,高处不胜寒。御史以纠举百司为职,容易得罪人,作奸犯科者往往会本能地对御史进行反噬报复,诬以不实,千方百计搜寻御史的不谨和过错,加以夸大并恶人先告状。所以,御史若稍有不慎或污点,就易被攻击者抓住把柄,不仅无法服众,自身也难保。太孺人要求两个儿子自律、自洁,保持自身素质,自身清廉干净,正己方能而后正人。两个儿子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张羽不畏权势,仗义直言,弹劾刘瑾罪状,被下锦衣卫狱。刘瑾伏法后,调任云南巡按。云南旧有银矿,太监私自开采,久为民害,张羽上书朝廷,停止私人开采。云南安宁州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的家乡,杨的儿子在其地倚势犯法,残害民众,张羽照样依法治罪。调任保定(今河北保定市)知府。保定地近京畿,豪门贵族较多,杨一清想借手中伤张羽。“羽单骑赴郡治”,治理不到三月,豪门贵族皆收敛气焰,不敢妄为。

正德七年(1512),由于张翀在上高县知县任内业绩突出,未待任满考评,朝廷就提拔他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张翀任职后,在纠劾百司时,以兄长为榜样,为了公理和正义,敢于坚持原则,勇于破除情面,决不徇私枉法,做维护专制体制和民生的卫道士。

正德八年(1513),张羽因病辞北京保定府知府而归,考虑家中经济条件差,准备应聘去外郡做私塾先生,拿高薪。太孺人对他说:“你因病不能当知府,不能为国家效劳,怎能为了高薪去当老师呢?你虽然穷,一定要辞掉,不能去。”

正德九年(1514),太孺人八子张璁亦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太孺人命长兄张羽训戒其弟,要他“竭诚报国”。综观张璁为官的30余年,能苟立于朝,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但“直谏”,而且敢于“死谏”。

张璁曾因上疏正名,力陈南巡之弊,谏阻武宗南巡,和以嫡长正传为国之大本为由,上疏劝说嘉靖皇帝认自己伯父孝宗(即武宗之父)为皇考,以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而两受杖刑。即使在遭投机小人张璁、桂萼排挤打击被贬时,并不因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消沉,而是秉承母训,“竭诚报国”,忠于职守,替朝廷分忧,为百姓办事。他在饶平创立书院,亲自授课,学生在科举中成名的有好几人。在海盐知县任内,“轻徭薄税”,“兴利除害”,海盐百姓“民思之不忘”,入祀名宦祠。在任湖广提学使期间,颁布教典条章,提倡培养道德品行,端正文章体风,湖广一带学风因而大变,考试所取之士,日后多为名臣。在陕西参政任内,张璁深受百姓爱戴,陕西百姓为其建了3座生祠(人在世时就建的祠堂,需国家拟准,非有大德不可)。后累迁至河南布政史,一切如长兄张羽旧政,“凡一切例规,悉从谢绝”,因此,河南百姓称赞他们为“一世两清”。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璁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即巡抚延安、绥远、榆林等地。张璁当时虽说已65岁,但依然风餐露宿,深入前线,丝毫不敢懈怠。视察后,提出应急兴办之事10余件,上报后均得到皇帝的赞许、采纳,并立为法令。经过璁与全体将士的努力,番兵两次入侵均被击退。捷报传来,朝廷下诏嘉奖,并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正德十年(1515),太孺人临终前不久,留言诸子,居家要务孝,做官要

清白奉职。留言诸媳,强调一个“贤”字,要“善助夫为义”。

试想,太孺人的“清白奉职”对儿子们的前途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可以想象,张羽因为弹劾刘瑾,被这位“立地皇帝”下锦衣卫狱,要是有一点问题,会被释放吗?在云南禁止太监私自开采银矿,堵了宦官的财路,张伦能不恨之入骨吗?判了杨一清倚势枉法的儿子,权倾一时的杨一清肯善罢干休吗?但正因为张羽“清白奉职”,刘瑾、张伦、杨一清之流尽管“甚憎羽”,但也毫无办法,最多只好通过调动工作,妄图假手保定豪门贵族伤害张羽,但邪压不了正,在张羽面前,保定豪门贵族也只能“视先生敬惮之,无敢挠治”。

又如张翀,嘉靖二年(1523),张翀升任江西广信府知府,广信地方在京城做大官的很多,这些京官的家属在地方上仗势欺人,鱼肉百姓,老百姓怨声载道。张翀到任后打击豪强,敢于为民作主,老百姓视其为“雨露”,而那些土豪劣绅连同他们在京城的后台则一心一意要扳倒张翀,但张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广信府的土豪劣绅们想找张翀的麻烦又找不到,只得在京城托人找关系,想把张翀调到其它地方任职,以便于他们继续在广信营私舞弊。

同样,太孺人那些身为朝廷命妇的媳妇们也没辜负她的希望,严守“贤”字,“助夫为义”。长媳李夫人对长辈“曲尽孝谨”;对妯娌们“动有观法,庭无闲言”,对侄儿侄女们如同自己生的一样爱抚;丈夫家贫,李夫人“独以粗衣粝食与儿曹共之”;丈夫任浙江淳安知县,卸任时无钱结清平时赊欠的日常生活费用,李夫人则用自己的手饰替夫还帐;因家贫,丈夫孤身一人赴云南任巡按、赴保定任知府,李夫人独自在家照顾儿女;丈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李夫人“恪供内政,尺寸不敢自私”;丈夫归休时,“篋中惟图书数卷”;丈夫以“清介名海内”,李夫人则以“和顺闻乡闾”。其他媳妇也都能以婆婆、长嫂为榜样,良于内助。

第三节 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称“横渠四句”，是凝聚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始祖张载哲学思想的经典之句，是在他苦心孤诣地思索之后产生的，也是他把自己一生为学的宗旨高度概括而成，更是他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的永恒的精神基础。“横渠四句”听起来真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古往今来，不知多少有大理想大志向的人引这四句话做自己的座右铭，把它作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节操和志向，竭尽毕生，一力奉行。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名和字均取义于《周易·坤卦》：“厚德载物”。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关学学派的创立者和宗师。祖籍大梁(今开封)，侨居郾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曾在横渠书院讲学，被后代学人尊称为横渠先生。张载一生穷神研几，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谛，屏居终南山之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宋史张子本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教养诸生以千数，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也给予他极高评价，大程(程颢)谈到张载的学术成就时说：“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小程(程颐)评价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朱熹也认为张载思想“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朱子语类》卷四)清初王夫之则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在历史上，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颐、



程颢合称“北宋五子”，他创立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并称为“濂、洛、关、闽”四大理学学派。

“横渠四句”的诞生，不能脱离宋初的建国背景。赵宋统治者总结国家长期分裂的经验教训，为了重建社会秩序，确立了“以儒立国”的国策。在这种政策环境下，以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为实现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秩序，进行了执着的探索。

张载“少喜谈兵”，“慨然以功名自许”，并联合焦寅（陕西彬县人）组织民团练兵，欲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想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为国家建功立业，并没有把研究哲学作为人生的志趣。21岁时，他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范仲淹在延州（今延安）召见了张载，“一见知其远器”，劝他道：“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勉励他读《中庸》。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经过十多年的勤学苦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也应该对“横渠四句”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张载曾在范仲淹身边读书三年，在范仲淹的指教下潜心研读《中庸》，返回横渠镇后也是如此，他说：“某观《中庸》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7页。）《中庸》中曾提出三个命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也就是孔孟道统之所在。但自汉魏以后，一千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能把《中庸》真正读懂，使得道统失传。面临着这种严峻的形势，张载把《中庸》的这三个命题转化成“横渠四句”。这四句话也就是四项研究的课题。“为天地立心”讲世界观，是对“天命之谓性”的研究；“为生民立命”讲人生观，是对“率性之谓道”的研究；“为万世开太平”是对“修道之谓教”的研究，反映了张载对社会安定、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至于“为往圣继绝学”，则是对道统的研究，就是继承孔子、孟子所创立而被后人所遗忘所曲解了的儒学，是对儒学整体精神的综合性研究。这些最后都在他所建构的“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的易学体系中顺利完成了，从而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理学奠基人的地位。

张载的“横渠四句”从表面看似乎是四句大白话,只是眼界高些,气量大些,有一种纵横古今的非凡气象。其实不然,作为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张载所表述的这四句话,每一句都暗含着极为深奥的哲理,甚而从中引发了非常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为天地立心

何谓“天地之心”?《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孟子亦云“心之官则思”,意思是:心的功能就是思索考虑(《孟子·告子上》)。因此,张载“为天地立心”,就是力求用接近科学的思维、哲学的思维获得对天地的正确认识。他所说的天地,不是指“日月星辰”这些“目之所止”的显著的形象(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中》,《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6页。),而是指天地的本质和规律,即对天地的理性认识。张载在《诗书》一篇中写道:“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张载:《经学理窟·诗书》,《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6页。)天地本来是没有心的,但人是天地所生,人有意识、有意志、有思想、有灵明,在天地之间为万物之灵。人能通过自己的知觉灵明认识天地,实乃是天地的自我认识、自觉灵明,所以人的心可以说就是天地之心。张载在其著作《经学理窟》中,对“立心”的涵义、方法等内容有集中的论述。因此,为天地立心实质是为天地立人,就是通过智慧启迪,充分发挥人的知觉灵明来认识和理解宇宙的本质和规律。人如果能把自己的知觉灵明、认识能力、思维水平发展到最高程度,达到对天地间的事物和规律的正确、深入的理解,这时“人心”与“天心”相合一,这就是“为天地立心”。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哲学揭示宇宙的本质和规律,达到对宇宙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真理性的把握,从而使人心“合天心”。

二、为生民立命

“生民”指民众,“命”指民众的命运。历史上长期流行的是命定论,认为人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然而张载却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人就能够在精神价值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因此,“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做人准则和人生价值目标,就是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确立生命的意义。

张载认为,“为生民立命”是哲学的一个崇高使命,是给人寻找一个“精神家园”,为人生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他的《西铭》对人的精神家园即“立命”之地做了全面描绘:“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认为宇宙好比一个大家庭,乾坤是其中的父母,人好比其中的儿女,这个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以他人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乐天知命,和睦相处。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每个成员就应该担负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做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在张载看来,“乾父坤母”“民胞物与”就是人生最崇高的价值目标,最美好的精神境界;而人在有生之年尽其作为宇宙的成员和社会的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则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准则。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张载为生民所立的“命”“道”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尽善尽美,只是想说明,张载是在自觉地通过他的哲学活动,为实现“为生民立命”的哲学使命而努力。

三、为往圣继绝学

目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往圣,是指历史上那些已经逝去了的圣人们,具体指孔子和孟子。“绝学”,是指由前人所创立,却已经被后世之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的学问,或指中断了的学术传统。其实,这就有点简单化了。

儒家所谓圣人,其实就是指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那么,哪些人是圣人呢?孔子当仁不让,是公认的圣人,孟子却不然,北宋初年的李觏著《常语》,首先批评孟子,他认为孟子是以仁义“乱天下”,其仁义之说,与“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即兵家孙武、吴起的智巧,纵横家苏秦、张仪的诈骗,源虽然不一样,而“其所以乱天下”的结果则是相同的。所以他说:“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一作五伯,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意思是说,孟子是大乱天下的罪人。

另一个学者郑厚叔(叔友)著《艺圃折中》,指出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乃是“忍人”、“辩士”之类,才性轻薄。孟子口口声声“诵仁义”,乃是“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想做高官,玩的是一套“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孟子同告子、万章、公孙丑等

人辩论,每次都“困而遁,遁而支离”,“沮气赧颜”,理屈辞穷。

司马光著《疑孟》,说孟子做官,是“为礼貌而仕”,“为饮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与郑厚叔议论相似。司马光以后,还有冯休作《删孟子》,晁说之作《诋孟》,也都是重申李觏等人的观点。

与之相反的是二程和张载。

张载率先在著作中把“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并提,把孟子提升到和孔子一样的位置。他说:“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2页。)这是说,《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都是出自儒家创始人的真传,是学者为人、为学、为政的根本。二程也大力宣扬孟子的功绩,说:“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以见之矣。”(《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孟子言语,句是实事”(《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五),又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是一个仁义,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所以程颐的结论是:“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既然如此,后面的“绝学”则肯定是以孔、孟之所创立而被后人所遗忘所曲解了的儒学。在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一致的观点,就是大家都认为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学说尚有传承,可是到孟子去世之后,儒学思想就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后继无人,已经基本陷于消亡的困境,成了一种“绝学”。在《张载集》中,张载把这个现象称为“学绝道丧”。

张载曾作《圣心》诗一首:“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张载:《文集佚存·杂诗》,《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68页。)

基于“学绝道丧”这样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张载认为,只好由后来的学子们重新继承古人思想,恢复这已经快要消亡的儒家绝学。现在关键之所在则是“继”了。在这方面,张载自己就是一位勇敢的先行者,《张载

集》中有这样的话：“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下》，《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9页。）表明了张载身体力行的决心，希望能靠着自己的努力使这快要断绝的“孔孟之学”重新延续，发扬光大，成为一个完整丰富的哲学体系，为当今社会做出贡献。所以，张载自信心十足地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4页。）意思是说，在孟子以后，张载以前还没有出现真正继承孔孟儒学的学者，他自负是上接孟子的儒学道统传人，他所说的此通“今日复有知者”，其知者就是他！张载还说：“某自今日欲正经为事，不奈何须着从此去，自古圣贤莫不由此始也。”（张载：《经学理窟·自道》，《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91页。）所以，他要以“正经为事”，以此作为成圣成贤的起点。张载继承“绝学”，却并非照搬前人，而是力求创新，在他的学说中有不少内容是六经所未载，前圣所未言的。后来，他著《西铭》，被誉为《孟子》之后第一书，《四书》之后第五书。所以，大程说：“《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小程说：“若《西铭》，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同上）小程肯定“《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河南程氏文集》卷九《答杨时论西铭书》）可见，《西铭》实际已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具有同等地位，成为洛、闽学者认识“圣门蹊径”的“初学入道之门”。故《宋史·道学传》云：“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而熹而始著。”历史正是如此。

四、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大同”等观念，是周公、孔子以来的社会政治理想。到北宋，以范仲淹、李觏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提出过“致太平”的主张。“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指明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途径。中国古代的儒家哲人主张“内圣外王”之道，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之道，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张载继承了儒



家这一传统,明确地把“为万世开太平”即展示美好的社会理想作为哲学的崇高使命之一。

张载是个忧国忧民的热血之人,他着眼于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解决,首先就是为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建设一个最基本的太平制度,特别务实,在他看来,能让百姓吃得上饭,穿得上衣,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才能安定人心。在《横渠易说》中张载提出:“家道之始,始诸饮食烹饪。”(张载:《横渠易说·下经·家人》,《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35页。)又说:“家人道在于烹煮,一家之政乐不乐,平不平,皆系乎此。”(同上)在张载看来,达到“足民”、“均平”,天下就会长治久安,万世太平。张载还说:“家不富,志不宁。”(张载:《横渠易说·上经·泰》,《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5页。)在封建社会里,家又是国的基础,“家不富”不仅无法安居乐业,无法进行教化和稳定人心,还必将动摇封建社会的基础。

至于怎样实现万世太平,在《经学理窟》中张载毫不隐晦地说:“人主须有仁心。”(张载:《经学理窟·周礼》,《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1页。)他要求皇帝学习孟子,以“仁心”施“仁政”。他还说:“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见可欲,而盗必息矣。”(张载:《正蒙·有司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7页。)监督统治者,这是孔孟儒家思想的真正核心。

综上所述,“横渠四句”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价值取向,而并非空洞虚幻的追求目标。“横渠四句”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不是单独存在的。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从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横渠四句”和上述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精英们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因关切国家和民族命运而产生的忧虑,包含着为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怕千难万险的大爱情怀。顾炎武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李二曲在为弟子所口授的《授受纪要》中强



调要像张载四句所说的那立志做人,那样“立身要有德业,用世要有功业。……志不如此,便不成志;学不如此,便不成学;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按照张载名言去治事,才是“天下第一等事”。朱轼在康熙五十八年本《张子全书·序》中引用了张载四句名言之后感慨地说:“卓哉张子,其诸光辉而近于化者欤!若其所从人,则循循下学。”由此可见,张载提倡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已经成为明清儒者所共同认可并立志为之奋斗的哲学目标和所追求的价值理想。即使在当代,在全国人民砥砺奋进,为实现“中国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横渠四句”最能表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最高的向往,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乾隆皇帝为四库全书作序时,没有引用孔孟的话,而是引用了这四句话。即使在当代,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还常常以这四句话来激励自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引用了“横渠四句”,如2016年4月26日,他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不遗余力地接纳西方文化。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崇洋媚外的风气蔓延,西方文化像洪水一样泛滥,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阻挡”这洪水的泛滥,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因为中国的文化古老、丰厚、博大,直到现在还没有被超越,还可以让后人研究。这种文化是完全可以跟

泛滥的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党中央“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正是承载先哲理想、实现中国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

2017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又强调,“要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因此,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结合研究张载的“横渠四句”,在当代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第四节 谱中名人

明清两代,在张氏三凤堂中,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人才,显示出人才团聚的优势,他们在泰兴文化领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中国学术史上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一、张羽。是一位正直的官员,是泰兴封建士子的一面旗帜,其著作《东田遗稿》是泰兴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文集。入选《四库全书》是很不容易的,《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认为“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认为“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理由是“阅时未久,珠砾並存”(《四库提要·别集序》)基于这种认识,四库所收明人别集只有二百部。

《东田遗稿》卷上中收录了张羽的诗共二百余首。

张羽写诗,崇尚唐音,颇注意诗律的声调和意境的雄浑,读起来十分清新可诵,一些绝句别有风致,自成一格。陈田在《明诗纪事》中评论说:“其诗专讲音节,录其所作,固彬彬乎唐人之雅音也。”纪昀等人的评价是:“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澹静峭直,肖心而出,在明作者中可以自为一队矣。”

《东田遗稿》卷下中收录了部分疏札文,数量虽不多,但却能切中时弊。他的名篇《劾刘瑾疏》几百年来一直为泰兴士子所推崇,后人的评价是“词意壮烈,台阁伟之”。即使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泰兴修县志时,精选了五篇古文选,其中有明初大儒方孝儒的《希董堂记》,明状元焦竑的《遗节亭记》,张羽的《劾刘瑾疏》和其八弟张羽惠(印书时注意,羽和惠是一个字)的《谏南巡疏》也一道入选。

二、张京元。是泰兴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最大影响的人物,郭一鄂

评介他：“无始品翔千仞，学富百川，天挺宏材”。张京元著有《删注楚辞》一书，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以其奇幻的想象、崇高的理想、激越的感情、鲜明的形象和巧妙的构思一直是我国上古文学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楚辞的世界既博大精深，又令人神往！但是，楚辞的研究与研究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相比较，不知要难多少。就连为张京元《删注楚辞》作序的焦竑在序中也说：“离骚惊采绝艳，独步古今，其奥雅闳深，难以遽测。”因此，面对这座隐在云雾中的高峰，好多人望而却步，“有能虚心求之者鲜矣”，不是高手是不敢走进这个“世界”的。张京元研究楚辞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以批判王逸和朱熹而成为中国楚辞研究中开宗立派的人物，他不作“遵用朱子之书说者”，而是“核者存之，谬者祛之，未备者补之，或辞意未惬，即出自大儒不难为之定正”。所以，焦竑称赞他“令读者不主故常，而得作者之本旨，君诚独得其解，而非随人以为妍媸者已”。我曾读过一本《删注楚辞》的戴震批注本，戴震，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在书页的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戴震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空白页还有姚江卢文弨为戴震《屈原赋注》写的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戴震突破儒家传统的楚辞研究，是在继承张京元对儒家文艺观的否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张京元还著有《寒灯随笔》一书。对于前人多有阐述的“四书”，张京元不是照着孔孟说，而是接着孔孟说，得其志趣之所向。故郭一鹗称赞他：“无始随笔而记四书，书不必尽说，说不必尽阐，阐不必尽强，合千载之全晤，言于一室之内”，“以其余绪妙析奇旨，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张京元更以小品文见长，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小品作家，是创造艺术意境的高手，郑超宗对他的评价是“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他的小品文集代表作《湖上小记》“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可以作为意境营造的典范。

在《湖上小记》中，张京元选取西湖最有特色的风景点，以简约传神之笔，勾勒出西湖的风韵，以审美的眼光去品赏山水，选择景物，加以组织，通过烟云象石、涧溪竹树，抒发胸怀情趣，创造出隽永的意境，他把自己的性灵与西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情思与天籁高度统一，使山光水色具有了人的灵性，使山水也成了有生命有品格的自然，成为“天人合一”的活山活水。这样的小品，以高远的意境和深刻的历史感，开拓了山水小品的新的

写作途径。

三、张城。自幼聪明,十岁即能写诗作文。景泰元年(1450)举人,“以诗赋翰墨驰名”,天顺五年(1461)选授为中书舍人,“学博才优,朝中制作多出公手,因有张半朝之称”,天顺八年(1464)二月,张城奉诏出使朝鲜,颁发宪宗朱见深登极诏。张城及张氏三凤堂族人都以为被任命为使臣是皇恩浩荡,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当时,明王朝已经意识到朝鲜“文物典章,不异中华,而远超他邦”(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是一个礼义之邦。为了宣扬国威,传播教化,显示人文大国地位,必然要派出真正有才学的大臣,方能令朝鲜信服,以适应明王朝和朝鲜的诗赋外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使臣虽都是擅长文学之士,但都不是重臣,官阶都不高,这实际上是为了向朝鲜暗示自己高高在上的宗主国地位。明王朝在笼络朝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要维护自己的大国权威,面对政治上的困境,它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外交方式,在不损害自己威严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表现出友好的姿态,而这些使臣就是用来体现这种指导思想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自身带有一种矛盾的张力:才华横溢却不居要职,颇具个性却忠心耿耿。出使朝鲜,除了皇帝召见,赐一品服,虎节龙旌,驰驿前往,兵丁护航,出使国则以天使接待,荣耀非常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朝廷承认使臣“真正有才学”,张城是以举人身份入选的,所以特别引以为荣。

为了纪念张城一行的这次访问,朝鲜国王命令其臣把张城访朝期间的记行题咏加上他们应酬唱和的诗篇汇刻成册,取名《皇华集》,为中朝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张城著作有《西庄遗稿》4卷,已失传。《皇华集》有两个版本存世,比较完整、全面的是曾在朝鲜汇辑刊行的铜活字本,其中存张城诗59首,文3篇;另一版本见《延令张氏三凤堂族谱》,收录的《皇华集》中存诗16首,其中8首是朝鲜版本中所没有的,基本上是张城赴朝途中在国内时的诗作,故朝鲜版的《皇华集》中没有收录。

四、张金镜。为泰兴著名的经学大师,“悉心经籍”,“一切经传子史暨秦汉唐宋诸书,无不源流通贯”,为“江淮名宿”。

张金镜一生“殚心撰著”,同弟遴士等著有《四书说约》、《诗经集注》、

《易经合参》等书,“行世江淮之间,纸贵一时”。后人称赞他“著书不倦,研理精详,文成珠玉,字挟风霜”。

五、张茂枝。从小聪明,“生而颖异,十岁能属文,出语惊人”,学习也很刻苦,他常说:“读书不苦不得力”。史载,张茂枝“嗜学,习勤苦,宅后有小园屋数椽,兄弟(二弟张桂枝、三弟张凤枝)诵读其中,刻励切劘,每夜达旦不寝”,因此,“甫冠,名隽一觐”。时任泰兴县令的陈棐也是一位“善论文”的中州名士,对张茂枝很赏识,“每得公(指张茂枝)文,如获异珍,不释手”。

张茂枝一生撰写了许多著作,据记载有《五茸游草》、《九子秋吟》、《浣花居稿》、《罨画溪诗词》等,这些文集“为当代钜公鉴赏”。

六、张丕扬。为清代康熙朝泰兴著名诗人,有《木田诗钞》八卷传世。清初号称“领袖诗坛”的王士禛曾于江都顾图河家中看到张丕扬的诗,“赏叹不止”,给予很高的评价,“其词之清和纯粹,独步一时”(《木田诗钞》序)。康熙四十七年秋,王士禛与张丕扬相晤于金台,王士禛因为高兴,急匆匆的迎接张丕扬时,鞋子都穿倒了,“余得倒屣”,见面后“亟索其稿”,“受而长吟”,“以为金石之声,芳兰之韵,非掇拾长庆(指唐元稹、白居易)、剑南(指南宋陆游)可比。”因为王士禛当其时是诗坛领袖,故张丕扬“以评与序相属”,请王士禛为《木田诗钞》写序与诗评。受张丕扬之托,王士禛“历半载,携在行笈,古驿秋灯,点次於萧森落叶中”,用半年的时间,不仅为《木田诗钞》写了序,还认真地为每首诗都写了诗评。田实发则说,“先生天资警敏,超绝一时”,称其诗“潇洒绝尘,淡而远,外朴而中华,摇笔数千百言,如夙构而意致,层叠若攒峰簇岭,为苦思力索所不到。”曾任安徽巡抚的江宁人陈步瀛称张丕扬“公才弥宏,研经究史,文追韩欧,诗逐杜李,鸿篇钜制,洋洋盈耳,经行明修,蛟腾凤起”(《内阁中书崇祀乡贤张北溟公赞》)

在中国文化史上,张丕扬还做了一件大事,他将季振宜编辑的《全唐诗》誊清本进呈给了康熙皇帝,而圣祖玄烨则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十九日,即在其第五次南巡的期间,将张丕扬进呈的这套书颁发给江宁织造曹寅,曹寅所主持的扬州诗局以此为重要底本,编纂了《御定全唐诗》。



张丕扬进呈的这套誉清本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时至今日,我们从这套季振宜“命书佣缮录”的“正本”《全唐诗》上的收藏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钤有“扬州季沧苇氏珍藏记”、“扬州季南宮珍藏记”和“树园图书”三枚收藏印。证明此誉清本在季振宜去世后,先传到季振宜的六弟季八士手上,季八士钤了“扬州季南宮珍藏印”。以后,又传到张丕扬手上,张丕扬的夫人是季振宜之父季寓庸的孙女,也就是说,再传至季振宜的侄女婿。张丕扬将此书收藏于树园中,并加钤了“树园图书”收藏印。

近十多年来,张氏三凤堂家族后裔对家谱家训、名言格言的整理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和巨大的精力,就是要为族人建立一个样本,对族人产生激励作用,成为一种力量。用书面形式记录的祖辈们的言论、思想,无形中会产生一种权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可视榜样。这不是单纯的停留在思慕、追念上,而是要认识自己家族的特点,更主要的还要从家族的历史中找到自己道德上的、观点上的以及行为上的准则。也就是说,希望通过实在可见的事实、言论,昭示家族子弟以一定的规范。家训等文献的整理,就是要在祖先与子孙之间建立起一座互相沟通的桥梁。八百多年的家训资料,将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至善至孝的道德规范,融化在后人的血液中,积淀在后人的生活里,不但用以律己,而且用以教育后代。

当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大踏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历史表明,党中央“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正是承载先哲理想、实现中国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

第五节 延伸阅读

张氏三凤堂家族是明清时期泰兴最为鼎盛的一个封建望族。明清两代,家族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显著成绩,共有进士十二名,其中状元、会试亚元各一名,进士人数居泰州之首位,举人三十余名,贡生以上功名者达二百余人,代代人才辈出。宋元明清,泰兴推举乡贤十二人,三凤堂五人。

张氏三凤堂家族奉张载为始祖,奉张本真为始迁祖。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名和字均取义于《周易·坤卦》:“厚德载物”。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关学学派的创立者和领袖。祖籍大梁(今开封),侨居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曾在横渠书院讲学多年,被后代学人尊称为横渠先生。张载一生穷神研几,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谛,屏居终南山之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宋史张子本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教养诸生以千数,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西铭》被誉为《孟子》之后第一书,《四书》之后第五书。张载的名言、人称“横渠四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历史上,张载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他创立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并称为“濂、洛、关、闽”四大理学学派。

对于有这样一位大儒祖先,三凤堂的后人是感到自豪的,浙江慈谿人桂简在弘治十六年秋九月“敬之书”的《泰兴张氏家谱序》中说:“尔祖横渠



先生之在宋,为一代名儒,作《正蒙》、作《东西铭》,闻之于朝廷,推重于当时,传之于后世,子孙至今蒙其福泽,发身科第而登名仕版者,其来未艾。”

《泰兴张氏家谱序》中还说:“本真处士本河南人,横渠先生之后,遭逢乱世,随宋南渡,寓居泰兴,子孙世为泰兴人。”

张氏族谱载:公元1127年,是一个充满血雨腥风的年代,金兵攻陷开封,张载的孙子率领族人保家卫国,和金兵展开激战,不幸身亡,族人死的死,逃的逃,整个家族遭到了灭顶之灾。

张氏三凤堂家族的后人详细地描述了当年的情景,开封郊外,胡笳声声,战马嘶鸣,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围城的金兵正和一支突围的队伍进行殊死的厮杀,这支队伍军民参杂,由一老者率领,队伍中,一只硕大的猛犬紧随战马在飞跑,人们发现,狗身上竟还绑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突围时为什么要将婴儿绑在狗身上呢,要知道,包围开封的金兵是一支虎狼之师,开封城内数量超过他的北宋“禁军”,皇帝的卫戍部队都不敢与之争锋,突围时如果将婴儿带在马上,必然是个累赘,影响突围,绑在狗身上,让狗随马奔跑,一道向外冲,也是个无奈之举。暮色中,两个杀出重围的青年壮士从狗身上抱下早已哭哑了嗓子的婴儿,带着混身血迹斑斑的猛犬,策马向东南方向奔驰而去。杀出重围的这两个青年壮士就是张载的两个曾孙,他们携带家谱投奔了高宗,并跟随宋高宗一路南逃至扬州,金兵跟在后面追杀,到扬州后,整个家族已经仅仅剩下兄弟二人及老二的一个孩子了,老二家孩子的幸存全亏了张家养的这条狗子,在千军万马中保护小主人未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老大就把所携带的金帛图籍全部交给老二,并关照兄弟说:“当前兵荒马乱,继续这样下去,一家人要想都生存下来很困难,不如就此分手,我回河南继续组织义军抗金,你找个地方先住下来,把孩子养大成人。”说完,两人相泣而别。从此以后,天各一方,就再也没有老大的消息了。后来,老二带着儿子一路逃难,当走到泰兴司徒庙桥西(原城西小学对面)时,一路跟随主人的狗子赖在地上,再也不肯走了,反正老二逃荒也没有个固定的去处,小镇安谧,民风淳朴,就干脆在泰兴安下家来。这个在泰兴落户的老二连名字也没留下来,张氏三凤堂的后人只好尊称他为南渡祖。后来,为了纪念那条在千军万马中保



护小主人未受到伤害,为张家立下汗马功劳的狗子,张家在当年狗子不肯走的地方专门修了一座“狗狗庙”,庙临街的墙上嵌了一块大石头,刻了这条狗子的像。从此以后,张家的子孙不管在外做到多大的官,回泰兴都要到“狗狗庙”磕头,感激它的救主之恩,这一风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二家的儿子渐渐长成,即张本真,后裔们尊称他为本真公,为泰兴张氏三凤堂始迁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张本真终于在泰兴站稳了脚跟。俗话说安居乐业,建房作为大事提上议事日程。

建房先要择地,在择地上,本真公家学渊源,高祖张载对易学颇有研究,宋嘉祐初年,曾在京师坐虎皮讲易,“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高祖的易学大作,无论是早年的《横渠易说》,还是晚年的《正蒙》,本真公都能倒背如流,而对于《水龙经》等堪舆书本真公也有颇深的造诣。泰兴属于平原地区,无山脉可依,择地只能以水代山,“行到平原不问纵(指山脉),只看水绕是真龙。”水系形势与择地的关系,水龙寻脉的要旨与法则,本真公是成竹在胸的。

这天,本真公进得城来,当其时,泰兴城内住户不多,河流纵横,然而本真公深知,水有大小,有远近,有深浅,安家乃大事,不可贸然见水便为吉。当下各处一一细细察看,以水的源流和形态为依据,审其形势,察其性情,别其吉凶,以作取舍,看了几处,都不甚满意,只得悻悻而归。

又过了几日,本真公去新建之孔庙朝拜,到得庙前,向东南望去,本真公不禁眼睛一亮,两水屈曲由北而来,流速平缓,蜿蜒迂曲,流过孔庙后呈环抱之势,分别汇入一池,汇聚之水清静悠扬,池南小河向前东拐之后,逶迤南行,荡荡悠悠,盘桓欲留,好像满怀留恋之情,一步三顾穴,尤以环抱之处水流为佳,曲曲如活,四周芳草丰盛,虽已深秋,但仍青青翠翠,给人以良好的视觉感受。本真公不禁叹道:“气团势聚,真乃佳壤吉水也。”《水龙经》中“舞凤”一节油然而然的浮现在本真公脑中,本真公不禁吟出声来:“群流飞舞入垣城,凤舞鸾翔羽翩轻,更得穴中真气给,不为仙客也公卿。”

选好地后,本真公择吉日开工建房。从此,张家在泰兴有了定居之



处,正式落户泰兴,“世居邑之东门,隆兴桥前”。因家族居住在隆兴桥之东,时人遂称该家族为隆兴桥张氏家族。

后来,到了明弘治、正德年间,隆兴桥张氏家族的八世孙张羽、张翀、张羽惠(印书时注意,羽和惠是一个字)兄弟三人相继考中进士,并都任过御史,朝廷为他们敕建了“三凤”牌坊。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实,隆兴桥张氏家族遂将家族的堂号命名为“三凤堂”。

八百多年来,从这个家族中走出过博雅端方的天国使臣,走出过神秀颖发的耿介御史,走出过士民怀仰的挂印知府,走出过忧国忧民的铁骨铮臣,走出过悉心经籍的江淮名宿,走出过敦尚名节的德高乡贤,走出过勤政爱民的武状元。这里曾为《四库全书》增添过精彩的奇葩,这里曾孕育出展现聪明睿智的小品,这里曾发出楚辞研究中开宗立派的宏论,这里曾飘逸出芳兰之韵的吟唱。

张氏三凤堂家族延续数百年的兴盛,像谜一样困惑着人们。幸有传说,幸有历史记载,幸有众多的家谱,幸有祖先留下的大量著作,更有张氏先贤留下的众多家规家训,让我们拨云见日,找到了使张家经久不衰的法宝,那就是恪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三凤堂这个家族的精神内核和灵魂,而文化的传承则是这个家族绵延振兴、长盛不衰的基础,家风象一根看不见的红线,连接着世世代代的张氏子孙。

清代泰兴县第一任知县陈棐曾说:“其家教以朴诚、以醇谨、以与人无侮无畏,其子孙世守其教。故张氏世多长者。”陈棐强调了“家教”的作用,即家族中长辈对晚辈的教育、训导,和晚辈的“守其教”,按长辈的教育、训导去做。在这里,长辈的教育和训导即家训。那么,张氏三凤堂家族的族谱上有哪些突出的家训呢?试举几例:

“六有”,即“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言有教,动有法”,就是言语要合于圣教,说话要有教养,一言一动都必须含有教育意义,行动应有规矩,要合于礼法;“昼有为,宵有得”就是白天积极做事,身体力行孔孟之道,不要虚度年华,晚上应当静思自己的得失,注意总结,肯定成绩,克服不足;“息有养,瞬有存”即一举一动要有教养,每时每刻留心存养心性,哪怕是瞬息之间也不能放心外驰,免受不良影响,瞬间

小事,都应有收获。“六有”是张载的父亲在四川涪州任知州时对儿子的教诲,张载牢记在心,当他十五岁拜谒勉县武侯祠时,在向诸葛先生像行过礼后,将父亲的“六有”写在墙上,传颂至今。

“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简意宏、掷地有声,并被后人尊称为“横渠四句”的名言的作者是张载。“横渠四句”是凝聚张载哲学思想的经典之句,也是他一生为学的宗旨和归宿,更是他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的永恒的精神基础,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横渠四句”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价值取向,而并非空洞虚幻的追求目标。“横渠四句”实际上已经成为明清儒者所共同认可并立志为之奋斗的哲学目标和所追求的价值理想。

“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这是《张氏家乘·孝子传》中记录的张氏三凤堂家族始迁祖张本真的一句话。

(张定供稿)